政府·市场·大学:谁决定大学教育的主流话语

钱 民 辉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我国大学与政府、市场的关系,可以根据伯顿·克拉克的"三角协调"理论进行解释。通过历史和比较分析发现,"三角协调"的三方关系似乎并不存在,大学作为一个学术行政组织一直是隶属于政府,受政府的管辖与支配;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后,政府支持和鼓励大学在多元筹资中开拓市场渠道扩大办学资源,于是逐渐地产生了大学与市场的合谋。结果,大学过度市场化影响了政府对大学的有效管理,而政府过度管理又让大学失去了自主性和竞争力,这样看,三方互动中就呈现出一种"线性推拉"的关系。但是从大学教育的主流话语看,政府、市场、大学的"三角协调"关系一直存在,所以应当重视采用"三角协调"的模式处理好三方的关系。

关键词: 三角协调理论;线性推拉;大学教育;主流话语

中图分类号:C 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5)05-0128-08

纵观近 20 年的大学变动,有两个大的变化引人注目:一是 1999 年的大学扩招,中国大学实现了从精英向大众化的转变;二是最近的大学结构上的调整,预计将有一半以上的大学转为职业技术性质的高等办学机构。显然这样的巨变不是大学单独能实现的,必须是由政府(国家)亲自发起,有计划、有准备、有目标地对大学系统进行改革。这让我们想起了 1952 年之前的由政府发动的对大学进行政治性的全面改造,以及之后的在大学结构上进行的大规模的院系调整,都可以看作是政府成功管理大学的先例。改革开放以后,由政府单方面决定、管理大学的模式发生了变化,先是依附于政府的市场与大学发生了联系,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市场体制由不成熟开始走向成熟。于是,市场开始单方面的影响着大学的生存和发展。特别表现在大学专业的职业化、市场培训的规模化、学术研究的功用化等方面。坦率地说,大学除了保留了一些传统的符号以外,大学市场化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对大学的失控或管理的失效将会导致大学意识形态上和实际作为上的混乱,特别是大学的分层和结构上的失调会造成新的社会和教育不公平,继而影响到社会稳定。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刚刚有点松绑的大学突然又绷紧了,让大学一下子感受到了处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拉力之中。僵持之下,一个微妙的三方关系形成了。这样的三方关系引起了学者的注意,研究中发现这也不是什么新的或特有的关系,其实欧美的大学很早就出现了这样的关系。其中有一种解说叫"三角协调"理论(The Triangle of Coordination),是由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Burton R. Clark)在《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1983)一书中提出的,详见于"整合"那一部分①。这一理论确实解释了大学与政府和市场的许多方面的联系,三个角也区分和说明了许多国家的情况。但是否解释了具有大学本体特征的大学教育的主流话语,以及中国本土的三方关系,这正是本文的好奇所在。

收稿日期:2015-06-20

作者简介:钱民辉,男,山东单县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① Clark, Burton R.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cademic Organization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137 - 181.

一、大学与政府:线性关系下的运作逻辑

从西方大学产生及发展的历史来看,大学确实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它自身不产生资源但又需要资源维持办学,因此早期不得不依附于富裕强大的教会,为教会培养神职人员。而在现代社会,大学为社会培养专业人才,其职能也由单纯的教学走向科研、社会服务而多样化起来。随着大学规模的扩大,政府开始接手大学并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在支持的同时政府对大学的控制以及控制的模式也日臻成熟起来。各国情况虽有不同,但政府与大学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即使是私立大学也不能脱离于政府之外。中国近代开始引进并建立的大学从一开始就是政府的产物,这与传统相符。举例来说,中国自从有了太学(教育史经常将太学视为西方意义上的大学,这里不争论这个话题),就是设在官府,所谓“学在官府”就说明了这一事实。由于太学就是为官府培养官员的,因此太学是没有所谓的学术自由和管理自主的。以至于晚近建立起来的仿西式大学,从一开始就想完全效法西方大学争取学术自由、管理自主的独立之精神,虽历经百年但却为何一直未果,盖有其历史渊源的。如果用比较的视野看,西方大学从一开始虽依附于教会和政府,但它是有着一定的自由和自主性的。因此有人说西方大学始终处在自由和控制的矛盾关系之中,当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时,提供它的资源就越来越有限;而依附于教会或政府时,其物质上就显得格外丰厚。① 这就注定了西方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不会是对立冲突的关系,而是需要不断主动协商直到达致一种线性均衡状态,这也是“三角协调”理论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而中国的大学从一开始就是由政府操办的,因此这不是单纯的依附关系,而是隶属和管制的关系。如此关系何谈独立自主学术自由呢?于是从民国以来,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是紧张的甚至是冲突的,大学的自由和学术的繁荣是靠着抗拒政府实现的。当然,北大与清华等校在民国时期出现的学术自由和繁荣,除了与政府的抗争之外,还有就是社会变动、战乱以及政府对大学管理毫无经验或顾及不上等原因所致。如果将这一时期的大学自由和繁荣看成是中国社会常态的话就未免太不切实际了,那确实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偶然产物。大学在那个偶然时期出现的灿烂成为中国大学永久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积淀,并且进入了大学的骨髓和精神之中。难怪动辄就有人以民国时期的大学大师说事,说实话,那时的大师有他特定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知识空间和学科界限,放到知识快速增长和科学不断地推陈出新以及专业越分越细的今天也依然会受到各种挑战和限制。再说如今的大学掌门人,他是在“科层制”下产生并受到更多更有效的制度机制控制,这必然会大大的限制了校长理想的大学理念和可践行的自由空间。

我们再放眼世界各国之大学,林林总总呈现出多元化的大学模式。有苏联政府主导管制的大学模式,这也是我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学习效法的模式;有政府与大学“共同决定原则”下的瑞典分权式的大学模式,我国也曾有过中央与地方政府对大学管理的集权与放权的钟摆时期;有政府支持和促进下的美国大学模式,这也是当前中国大学希望全盘照搬的模式;有试图脱离政府管辖实行大学自治和独立法人的日本大学改革模式,我们也搞法人但更强调的是在党政体制下的法人;还有政府干预下的削弱大学学术权力而试图强化国家管理权力的英国大学模式②。当然,上述各国的情况都在发生着变化,但不管怎样变化,政府对大学支配的逻辑没有改变,只是在支配权力的强弱上不断在调整着。毕竟,大学在今天的

---

① 伯顿·克拉克主编:《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6 页。

② 1979 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以新自由主义为理念,针对英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福利体制进行了一连串的市场化导向的变革,冲击了当时的教育理念与制度,并要求重新设计。但有意思的是这是政府直接主导的教育改革,因此出现了很大的争议,因为没有找到实际的市场,最终还是主张国家对教育的介入。在 1982—1986 年间,中央集权的趋势逐渐浮现。见苏峰山:“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市场:从英国教改谈台湾教改的市场论述”,该文载林本炫、邹川雄编:《教育与权力:一个批判的分析》,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18 页。

历史地位和功能已经足以影响一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大学的改革已经是牵一发而动全局了。试问,哪一国的政府能完全放弃对大学的管辖,而任由其自治?即使在自由的美国大学里,政府的意识形态也是随处可见的,至少在对不同移民的同化和整合上、对美国文化的认同上、鼓励和引导知识与科技创新推动美国经济发展上还是成功的。再从大学教育的主要过程(教学与科研)和大学影响社会的主流话语来看,其属性仍然是公共部门的,政府当然要将大学纳入到公共预算之中。从各国的情况来看,虽然有一种趋势显示,在民主化的大学运动中,大学增加了更多的自我调节和院校自治,似乎改变了政府与大学之间的权力平衡。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政府完全撒手不管了,大学其实是难以生存的,更遑论什么大学的自治和学术自由了。这可以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大学看到这样的情景,一旦地方政府对大学松绑并减少了资源支持时,这样的大学很快就会倒闭。幸运的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施压才得以保留住这些大学的存在。如果大学要求独立自主,地方政府巴不得让他们进入市场,由市场供需规律和竞争机制来决定大学的生存问题,这样就会迅速死掉一大批大学。

但是非常矛盾的是,大学一方面需要政府的资源支持,同时又不希望政府对学校进行干预和控制。因此在大学的亚主流话语中总是盛行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甚至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大学“去行政化”的诉求无非是学术权力向行政权力的一种挑战。从各国大学改革的经验看,还真没有一所大学认为自己已经是非常古老的而且是资源雄厚到可以完全脱离政府而存在了,而我们的大学既不古老也没有资源雄厚就敢于提出不要政府管制、不要行政权力,实行教授治校。其实行政治校、教授治学已经做到了可以维持一定平衡的分权治理,这本来是可以用克拉克“三角协调理论”解释的。但大学不喜欢这种合力下的均衡,认为政府你可以养我但不要管我,这个理可能有点说不通。从大学在今天存在的很多问题看,我认为不是政府管得太多(其实政府做了很多的让步,例如逐步放开的招生体制、多渠道筹措经费体制、各种名堂的教学改革等等),也不是行政化治校造成的,行政对学术的干预还是有限的。从问题的实质上讲,而是大学缺乏一种大学间和大学内的竞争机制。美国的大学之所以超过了欧洲那些古老的大学而引领了大学发展的潮流,其原因就在于存在着一个相对自由的竞争机制,同时也与政府保持了一个很好的协调关系,政府的作为总是围绕着支持和促进大学间的竞争与合作、大学内的优胜劣汰展开的。当这种市场机制引进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之中的时候,人们发现,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似乎更加容易协调了,对政府来说均衡比控制更节约成本也更加有效。市场是怎样进入到政府的运作逻辑里的,像竞争机制等这样的运作逻辑在中国行得通吗?这正是下文所要探讨的。

二、政府、市场、大学:三角协调还是线性推拉?

在这一部分加进了市场的因素,这就形成了克拉克(1983)的“三角协调理论”所说的合力下的三角关系。这一关系明显地区分了政府(国家)权力、市场和大学系统这三种势力,依据均衡和非均衡状态、与每一角的远近关系又区分出了不同国家的大学性质和模式。而对此的解释是:首先从政府来看,政府与市场、大学在均衡关系建立之前存在着单独控制大学的两个极端的形式:一个是所谓的“起促进作用的政府”,另一个是“起干预作用的政府”。前者是指一个政府赞同大学作为为那些具有正式资格进入大学的人提供一个机会,并不实际主导和管制大学的核心——如参与模式、内部管理、学术计划研发和内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等方面的政策。而后者指一个政府积极地卷入试图影响和控制大学的内部事务,大学和就业市场的关系,学术的政治方向以及学科的规划等方面。① 在实际的研究中发现,这两个极端的形式并不多见甚至都无法持续下去。按照克拉克的思

① 弗兰斯·F. 范富格特主编:《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路,该怎样协调政府和大学的关系呢？靠什么来协调呢？这是问题的所在。可以想到的最接近的因素如主管部门(教育部)、中介机构还是市场？教育部来协调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显然并不成功,因为教育部就是政府。中介机构还不成熟,还没有建立起让政府与大学都值得信任信赖的关系,也不可能。那么必然就是市场了。

谈到市场,对政府来说这个概念显然是十分清晰的,劳动力市场、消费市场、金融市场,再具体来说什么股市、房地产市场、批发零售市场、电子商务市场等等。但对于大学来说,这个市场的概念就显得十分模糊了,实际上是没有专门针对大学的一个纯粹的市场。改革开放以后,当政府引导要进入一个市场经济轨道上来,大学的市场化也就提到了议事日程。先不管理论界对于大学市场化争论不休的事实,这么多年来大学确实趟出了一条市场化的道路来。比如大学过去为学校教学服务的小型校办企业纷纷成为公司,以科技成果转化的名义创办大型公司和上市公司,以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名义举办各种培训班,最终还制度化成 MBA、EMBA 和 MPA 以及商学院和职业学院等。据说这样做是与国际接轨,然而看到大批热钱流入大学谁还会去论证这样做是否正当合法。当一座座旧的建筑被拆掉,新的大楼拔地而起的时候,大学雄厚的财力难道不是市场化的结果。当然,市场本身并不是一个秉持公平关照所有大学均衡发展的慈善机构,它一定是以价值和回报进行公平交易的。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在市场化中获得了资源和好处,可以说,绝大多数大学都还是靠着政府的财政和地方政府的支持维持着。看来,政府想通过市场来解决大学的资源和扩大发展的问题,实际上只是惠及了少数古老的名牌大学。虽然少数大学先富起来了,但并没有带领更多的大学共同致富。大学发展的差异越来越大,高等教育结构也越来越失衡。

由于资源的诱惑,大学与市场的结合显然越走越近,政府作为过去唯一的资源供给方本想减少财政支出而将大学推向市场,但结果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力减弱,面临政府管理失效的危险。具体表现在大学课堂上的言论过度自由,大讲什么政治上的西方宪政主义,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文化上的多元主义,历史上的虚无主义,还有什么自由、博爱等西方普适价值观等等。大学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和混乱这是政府最为顾忌和担心的,也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于是政府不得不出台政策和规定,重新约束大学的言论与行为①。还有就是中止和掐断了大学与市场的一些联系和关系,诸如校企剥离。因为这么多年,不知道大学办企业是大学受益了还是大学的企业受益了,亦或是市场受益了？是少数人受益了还是大多数人受益了,总之可以说是一笔糊涂账。大学本身就不是企业,企业内部核算和外部核算是有着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操作的,大学算不清这笔账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大学国有公有资产的流失这是不争的事实,最关键的是大学还被企业所控制。因为校企的领导和大学的领导有着说不清的关系,甚至一些名牌大学都会被大型的校企所左右,在资源分配上、甚至校内的人事组织关系上、招生舞弊等方面都会有校企权力介入的影子。这样的校企能不干扰了大学的正常秩序吗？校企权力扩张必然带来经济问题和经济犯罪,在当前的反腐败中不就是查处了一些著名的校企吗,对此大学的领导能没有任何干系吗？所以,由政府出面出台政策剥离校企关系,还大学一个清静是必然的。

大学与市场的联系还催生了一个外部巨大的教育市场,这个教育市场显然是针对中小学和大学发育发展起来的。先不论幼教和中小学的教育市场,仅从高等教育市场来看,其规模也是惊人的。据教育部《2012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仅 2012 年计,全国有职业技术培

① 2015 年 1 月 29 日在教育部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座谈会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高校教师必须守好政治底线、法律底线、道德底线,要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特别是加强教材建设和课堂讲坛管理,并提出:“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这可以看作是高校意识形态上的一个收紧了的信号。

训机构 12.38 万所,此外,还有民办培训机构 20155 所。从当年开办课程来看,语言类培训机构开设课程最多,将近 60000 门,其次为 IT 类培训机构;开设课程小于 10000 门的为艺术类、建筑类和公务员考试辅导类。从当年培训的规模看,全国接受各种非学历高等教育的学生 394.84 万人次,已结业 778.53 万人次①。其实这还是一个很保守的统计,实际的培训市场还要大很多。有大学院系举办的各种非学历的培训班、准学历培训班和学历培训班,还有院系与社会办的各种培训班,其费用逐年看涨。时下最流行的还有企业和社会办的培训班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巨大的培训市场师资从哪里来?大学就是其中一条主要渠道。大学老师到社会兼职上课,全国各地到处飞去讲课,这笔收入要远远高于在校拿的死工资。这样的金钱诱惑太大了,教师哪还有心思做好份内的教学科研工作。大学本是一个学术重镇,人类文明的净土。结果大学院系忙办班挣钱,大学教师忙讲课挣钱,大学的教学质量能不下降吗?大学的风气能好吗?如此看来,大学是不能单独与市场发生联系的,因为市场最终将大学带入了职业化、市场化、功利化、世俗化。所以,政府对大学与市场的关系不得不干预了,从出台的政策和举措来看,极大的限制和压缩了市场化的办学规模,进一步完善了对大学和教师的评估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大学教师外出进行营利性活动。

上述举的例子,我本来想用克拉克的三角协调模式做出思考和解释,但是发现,政府、大学和市场根本就不是一个三角关系,也不存在着协调的方式。客观地说,一边是隶属关系,另一边则是合谋关系。这样看来,倒不如说还是一种线性关系:即左边是政府,中间是大学,右边是市场。大学始终是处在政府与市场的拉力之中。怎样解释这种关系呢?我个人认为,对于政府来说,与大学的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或者放权,希望大学自己搞活,减轻政府负担;或者收权,缘于大学有着太多的自主自由后,导致政府管理失控失效。当然,过去不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有许多大学除了是国家教育部属类大学之外,还有很多大学是政府部门办学由部门专属管理。所以国家部委都有所属大学,这样既便于管理又便于调控。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部分部委的职能甚至机构都发生了变化,结果所属院校基本都归口教育部。教育部成为庞大的大学院校和所有这类教育的管理机构。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权力的过度集中所带来的管理上的困难是巨大的,所以引进市场的概念成为政府管理上的一种手段,于是放权就带来了大学与市场的合谋。那么,大学与市场是怎样合谋的呢?首先在意识形态上既承认大学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同时也声称大学具有非公共产品的特性;其二,承认大学在社会中的上层建筑属性,也承认大学具有生产力的性质;其三,大学生产知识、技术和课程,特别是科研成果和专利,因此大学具有服务要出售,而且买方市场非常大;其四,大学能开拓市场,引领市场,继而促进国家经济增长。正是在这些理由和主张下,大学与市场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两者结合的结果,在经济方面是双赢的,但是在代价上,大学却是违背大学规律也没有守住学术底线,而市场是只有规律只有交易不设底线。因此被拉下水或成为市场的婢女那就只能是大学。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就需要拉回大学到它应有的位置上,而市场也不断引诱和拉紧大学希望再合谋。如今的大学就是处在政府与市场的拉力之中,这样看来,大学是根本没有任何的自主性和自由的,这是真的吗?我们下面再作进一步的分析。

三、政府与市场:谁在决定着大学教育的主流话语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大学与市场的关系主要是受到了政府干预强弱的影响,一个政府(国家)对大学干预强的时候,市场对大学的作用相对就较弱,而政府干预弱的时候,市场对大学的作

① 见胡锦澜:“中国教育培训市场供需细分与市场前景分析”,搜狐教育,2013 年 10 月 26 日,网址:http://learning.sohu.com/s2013/jyktx23/

用就增强。大学在这种推拉关系中似乎是左右摇摆,根本没有自主性。其实在各国大学发展的历史中也可以看到,凡是政府干预强呈计划式的大学模式,大学基本是按部就班缺乏改革的动力和活力,自我调节弱;而政府干预弱呈现市场经济式的大学模式时,大学会充分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增强改革的动力和活力,自我调节强①。显然,后者是政府与大学都想达到的目标,但为什么政府对大学的权力放开后又要紧缩或收回呢?按照市场竞争机制"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效率优先"不是很好吗?原因不外是这样几种:其一,市场机制加速了"马太效应"。带有"先天优势"的大学获得了更多的资源,而普通弱小的院校明显的缺少市场的资源支持,甚至已有的份额还要被拿走。大学外部和内部的资源配置越来越不合理,大学结构也失去了平衡。其二,大学市场化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以政府管理失效为代价的,大学的公共产品性质发生了改变,这样必然导致教育不平等,催化了优质名牌大学更多地服务于权贵阶层,而普通民众越来越与昂贵的优质大学无缘。政府这样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西方社会早已出现过精英大学贵族化,以及今日分化成更为严重的为中上阶层服务和不平等社会再生产的精英大学。其三,对于我国的大学来说,办学的政治方向一直成为大学的头等目标。因此,政治思想教育、道德品质教育以及爱国主义教育总是渗透在大学教育和校园的主流话语之中。这在政府对大学干预强的情况下不会出现问题,但是,当政府放开权力,大学与市场联系紧密的情况下,大学教育就会出现多元化甚至冲突和混乱的话语体系,干扰了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方向。因此,政府的收权和干预就是必然的。

分析到此,看来政府和市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大学教育的主流话语。但笔者认为,真正决定着大学教育的主流话语,既不是政府也不是市场,而恰恰是大学本身,大学的主体行动者,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来看,政府是从外部整体上即宏观上对大学进行管制和干预,而不会在具体细节上,其实也无法顾及具体实施方面。举例一,教育部下文通知各大学应当将政治思想教育放到首位,应当成为大学教育的主要课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当是大学的主流话语。那么具体到怎样讲政治,在大学主流话语中怎样体现价值,这却是大学教师把握和控制的。举例二,政府和教育部要求大学在应届大学生就业上要保持在 90% 以上的签约率水平,而各大学都能完成任务,至于怎样完成的这个指标那是大学内部的事情。举例三,国家和政府希望在未来一定时期内能有几所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用什么标准?政府并没有明确。几所领命的大学倒乐得这样,于是自己确定了"率先"这个模糊的时间表,政府也如约通过财政拨下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经费。举例四,1999 年的大学扩招也带来了扩建,很多大学都从银行贷了款,大学不是直接生产和销售单位,如何还?各大学累计起来的银行欠款成为死账坏账呆账的至少也有大几千个亿吧,最后看来也只能靠政府买单了。举例五,一直以来大学对统一的高考制度颇有微词,现在政府给你自主招生的权力,让你扩大自主招生规模,结果自主就被滥用了。由于自主招生缺少相应的监管措施,一些大学的自主招生也被曝出了腐败现象。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是应当客观地承认,政府对大学并没有管得那么多,其实在很多方面,是大学在引导着政府,让政府心甘情愿地为大学买单。以上这几个例子是不是就足以说明大学不是没有自主,而是有着太多太大的自主了?

其次,在市场经济下,大学与市场是一种什么关系?谁是受益者?是大学在引导着市场发展还是市场直接影响着大学教育的主流话语?关于大学与市场的关系要在理论上解答确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按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构想的纯粹的市场经济,即使是在西方现代市场体系的国家中也绝无仅有。各个国家(政府)都会以各种方式引导或干预市场经济,而最近

① 弗兰斯·F.范富格特主编:《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王承绪等译,第 6—10 页。

活跃的新凯恩斯主义给政府干预经济又重新注入了活力①。如此说来,大学与市场的关系必然涉及政府这一面。实际上,市场经济最初的起步必须是依靠政府的政策和财政扶持才慢慢走起来的,而最活跃的市场都是在大学周边出现的,比如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成为清华、北大的产学研市场,而后建成的海淀科技园又成为两校产学研基地,还有称为"西部硅谷"的依托西安交大、西安理工大建成的电子一条街,后横跨两街一区发展了 1000 余家企业、科研机构,形成了产、学、研一条龙的西安市电子产业孵化基地,强劲的发展势头和西北地区的巨大市场潜力,成为西安信息产业的龙头。从这些科技市场发展来看,初期一定是依靠大学走产学研之路,之后,经过对大学研究成果的孵化,市场开始走产供销之路。在这一阶段,大学与市场的关系在政府的引导下还是一种相互扶持相互依赖的关系。而且这一时期用克拉克的三角协调模式可以解释得通,确实,大学与市场是一种协调关系。在这一时期的受益者是双方的,大学通过市场获得了经济收益,市场通过大学而逐渐扩大发展起来。除了电子科技市场外,大学与市场协调下又建起了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还有培训市场以及形成体系齐全的外部教育市场。可以说大学培育了市场,市场也为大学作了最好的回报。由于两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市场的力量开始渗透到大学内部的专业设置,科研市场化、课程职业化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甚至一些古老的名牌大学都以职业训练为重,渐渐的干扰了大学的学术和人文学科的发展。市场真的有这么大的力量吗?接下来我们再分析。

第三,大学真的是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摇摆吗?大学教育的主流话语真是受外部力量(政府与市场)影响和制约吗?大学的自主和自由真的就没有吗?回答这些问题,应该先从现象到本质进行分析。如果从现象上看,大学确实是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摇摆,政府稍微放松或适度放权,大学就滑向市场这一方。而市场以巨大的经济利益引诱大学按照市场的需要办学,特别是科研专利上、专业设置上、毕业生就业上以及各种市场化的培训上。这些表象确实存在,但它能代表了大学教育的主流话语吗?笔者认为根本不能,也根本不会。那么,从大学特有的本质上讲,大学的独立自主、大学中人的自由从来就没有缺失过,或以公开的形式存在或以隐含的形式出现。举例来说,最近几年出现的大学自主招生虽是教育部同意下实施的,但是大学在自主招生上的结盟,什么"北约""华约"和"卓越联盟",却不是教育部批准的。其规模越来越大,很有三分天下之势,你能说它没有自主性和独立性吗?还有,大学设立的双学位制度、通识教育学院、虚体研究机构、产学研模式等等,不都是大学自主就可以决定的吗?再说大学中人的自由,先不论其本源是来自西方大学的民主化影响,还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感召,亦或是成为知识分子就必须加入自由的行列等原因。大学教师缺少自由吗?我认为根本就不存在着缺少自由的问题,这样还不断呼唤自由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或是为了争取更多的自由。我们知道,大学在学理上有着批判精神,这是探讨学术所应具备的素质。当批判延伸至现实,甚至自由地扩大到对政府和国家以及对制度的质疑和否定时,这就在意识形态等方面出现混乱而导致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国家和政府才会出现干预,干预的结果无非是将你的自由回到你的限度之中。再从大学与市场的关系看,市场的力量似乎在决定着大学的发展,大学也在按照市场的需求调整办学方向。其实,这也是一种表象,代表不了大学的真实情况。比如说,大学承诺市场培养学术性和职业性的复合人才,而实际的情况是,大学只负责了培养学术人才,而职业型人才成为大学生个人的选择和技能储备。因

① 新凯恩斯主义者们继承了旧凯恩斯主义者关于国家(政府)应当直接干预经济的基本主张和做法,又借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某些合理的理论如供给学派的一些微观理论基础,同时又在反思并吸取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些宏观经济实践中得到的经验教训,最后综合考量了各方的争论和批评后,遂发展了有别于旧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新凯恩斯主义,其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较为具体的理论解释、政策主张和行动路径。

为大学内在的评价还是以学术为重，教师也是重学轻术，特别是大学的内在环境是抵制职业化的。再以科研论，经费充足当然是好事，但是申请什么规格的科研课题更为教师所看重。专利转化固然重要，但是专利获得国际学术界同行认可就更加重要了。所以，市场的力量可以影响大学，但还是有限的，因此说大学教育的主流话语本质上都是独立的、自主的和自由的。也可以说，政府和市场都只能在大学这个"黑箱子"外进行管制和合谋，任何想进到"黑箱子"里的努力似乎都是徒劳的。

四、小　结

本文最终也想说明克拉克的"三角协调"是一种理想的解释模式，但涉及三方具体的运作机制上，也就是内在的协调方式上似乎是无法解释通的。对于中国的大学，历史上有过很多次的改造和革新，貌似什么都可以改掉，唯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生命总能在浴火中重生。因为大学既不同于政府、无法按照政府的逻辑运作，又不同于市场总是需要博弈并进行理性的交易。大学是由专门的行动者所组成的独立的学术群体，它有传承也有生命，对于每一位坚守学术的人来说理想大于原欲，也就是说有着高于物质需求的自由之精神追求，这才是大学之本源。如果你将大学看成是行政科层制下的一个专门机构，那你就既理解不了大学也管理不好大学。本文揭示了这一点，并不是想放任大学无原则的独立和自由，而是希望政府与市场都能认识到大学有其内在本质的规律和特点，以及行动者的主观动机和精神支撑，从而避免简单行政化的管制和完全功利主义的市场运作所造成的双重失效。这就是说，依据三角协调模式，大学既不能行政化也不能市场化，一定要将大学看成三角关系中的一方，探讨适合我国大学实际情况的管理或协调模式。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大学在外部如果不依靠政府和开拓市场，是根本无法生存更谈不上什么发展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谓内在的独立自由也就成了虚幻的了。因此，三方先理顺独立与治理的协调关系，自由与共识的辩证关系，内在与外在的必然联系，未来的政府、市场和大学，才可以回到"三角协调"模式的对话之中。只有这样，才可望让大学既有效实现政府的管理目标，又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促进市场的发育和完善，还能在学术上、科学探索上、知识创新上、人才培养上以及价值与精神追求上实现大学的理想。总之，三方共赢，才是三角协调模式的最终效果。

The Government, the Market or the Universities: Who Determines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of Higher Education?

Qian Minhu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riangle of Coordination" theory by Burton R. Clark, this thesis trie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universitie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in China. Through historic and comparative analyses, the thesis reveals that the relationships of "the Triangle of Coordination" are seemingly non-existent among the three parties. As academic and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Chinese universities have always been par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ubject to its jurisdiction and control. Since China started to establish it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the government has supported and encouraged universities to extend marketing channels and expand educational resources by pluralistic financing, thus helping to gradually form the collusion between the universities and the market. As a result, the excessive marketization of universities has affected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universities by the government, while the excessive management by the government has caused the universities to lose their autonomy and competitiveness. Thus, the three-party interactions have taken on a "linear push and pull" relationship. B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Triangle of Coordination" among the government, the market and the universities will continue to exist, so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the Triangle of Coordination" mode to handl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three parties in a proper way.

Key words: "the Triangle of Coordination" theory, linear push and pull, higher education, mainstream discourse

（责任编辑　　刘曙光）